

## 第二章、相關文獻回顧

如前所述，本文主要之研究目的，為探討中國的財政地方分權化在其地區性經濟成長上所扮演的角色。因此，在本章中將回顧相關文獻，並將其分成三個小節來探討。首先，在第一節中先回顧論述財政地方分權化對經濟成長之影響的相關理論文獻，檢驗在理論基礎上兩者的關聯性及影響的方向。接著，在第二節中回顧研究財政地方分權化對經濟成長之影響的相關實證文獻，包含研究對象為單一國家，或是進行跨國分析的實證文獻，檢驗至目前為止在實證上，兩者間關係與影響的方向。而在第三節中，我們將特別針對研究中國的實證文獻，較詳細地進行實證結果的回顧與比較。最後，本章將於第四節中統合上述三部分，進行本章之小結。

### 第一節、財政地方分權理論

中國自 1978 年的改革以來，經濟成長非常的快速，而中國眾多的經濟改革當中，財政地方分權化的因素也被眾多文獻認為，是推動其經濟成長的要角。而本研究欲深入瞭解，究竟中國的財政地方分權化對於其地區性經濟成長的貢獻如何，首先必須對財政地方分權理論加以理解。

探討財政地方分權化與經濟成長間關係的理論文獻相當多，而理論上的文獻，基本上都支持財政地方分權化，對於經濟成長存在正的貢獻。Hayek (1945) 探討在社會中知識與訊息的使用，認為地方政府對於地方的種種需求，相較於中央政府具有較佳的訊息鏈結，而此種訊息的優勢將使地方政府較中央政府更能提供滿足地方偏好的公共財與公共服務。Oates (1972, 1993) 亦認為，地方政府相較於中央政府具有較有利的訊息優勢來提供滿足地方偏好及需求的公共服務，因此財政地方分權能增加經濟效

率。<sup>13</sup>

Bahl and Linn (1992)、Bird (1993) 與 Bird and Wallich (1993) 此三篇文獻，亦認為財政地方分權化或是財政權力的下放，是一種可以改善公部門效率的方式，進而減少預算赤字，並促進經濟的成長。於 Qian and Weingast (1997) 亦指出，財政地方分權化提升了各地方轄區間的競爭性，而這樣競爭性的存在，對於各地方政府不適當的市場干預產生了嚇阻效果。若一個地方政府總是進行效率低落的公共支出，將難以吸引可流動的資源 (mobile resources)。因此，由於這樣的競爭性存在，使得地方政府加深了預算的限制，並改變了地方政治家的誘因。是故，地方的經濟效率可能獲得提升，對於經濟成長產生正向的刺激作用。

Davoodi and Zou (1998) 對於理論幾乎一致地認為，財政地方分權化對經濟成長存在著正向貢獻的結論，提出了重要的解釋。其觀察到多數的傳統經濟理論文獻贊成財政地方分權化，是基於兩個互補的假設：第一個假設是，由於地方政府的訊息優勢，使得其相較於中央政府而言，具有較佳的能力來提供公共服務；而第二個假設則是藉由人口的可移動性 (population mobility)，以及地方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務間的競爭性，能確保地方民眾的偏好與地方政府所提供之公共服務能夠契合。關於上述第一個假設，是根據 Oates (1972) 所提出的“Oates’ Decentralization Theorem”，而第二個假設則是源於 Tiebout (1956) 建立的“Voting with feet”理論。<sup>14</sup>

---

<sup>13</sup> Oates (1993) 文中指出「財政地方分權增加經濟效率的基本經濟實例：當地方部門能夠依據地方偏好及環境所需求而提供公共服務，相較於忽略了地理間差異而進行統一決策的中央，將能為地方帶來更高的福利水準。由地方來提供公共建設甚至是人力資本，將可能比中央在忽略了地理間差異而做決策下，對於經濟發展更有激勵作用，這無疑地是由地方來提供的強而有力的理由」。

<sup>14</sup> 於兩個假設間，具有相當緊密的關係。“Oates’ Decentralization Theorem”的基本前提假設是，相信地方居民能夠在地區間自由的移動，並自由選擇提供公共服務與徵取之稅負符合自己偏好的地區。意即，建立在相信 Tiebout “以腳投票”的假設之下，才有“Oates’ Decentralization Theorem”的推行。

觀察傳統的財政地方分權理論，可發現的是在理論上，財政地方分權化能透過增加經濟效率，進而刺激經濟成長。這樣的傳導過程幾乎是被一致同意的。然而，理論上所呈現出的一致，是立基於財政地方分權理論的基本假設皆成立之下。故有部分文獻指出，倘若基本假設無法維持，則財政地方分權的效果將可能不利於經濟成長。<sup>15</sup>

---

<sup>15</sup> 部分文獻對於財政地方分權有利於經濟效率與成長提出質疑，包含了 Prud'homme (1995)、Tanzi (1996) 與 Jin and Zou (2003) 皆指出，倘若財政地方分權理論的標準假設無法維持，則財政地方分權化對於經濟效率與成長的效果，將可能是不利的。

## 第二節、財政地方分權化對經濟成長影響之相關文獻

本文主要之研究目的，為分析中國的財政地方分權化，對於地區性經濟成長而言，所扮演的角色究竟如何。而就目前為止的實證文獻，不論是對於中國等等單一國家，或是進行跨國分析的研究，均沒有一致的看法。有些實證文獻無法在財政地方分權化與經濟成長間發現任何關係，甚至得到否定傳統財政地方分權理論所提出，財政地方分權化增進經濟效率，並進一步刺激經濟成長的結論。

就單一國家的實證研究中，財政地方分權化對經濟成長的影響效果如何，無法呈現一致的態勢。Xie et al. (1999) 認為在含有不同層級的政府支出下的內生成長模型，可以證明財政地方分權化的確會影響長期的經濟成長率，且發現美國現存的各級政府支出佔聯合政府支出比例，已經與成長極大化下一致，若是再進一步的分權化則可能對成長造成傷害。<sup>16</sup>

與 Xie et al. (1999) 的結果相反，Akai and Sakata (2002) 則提供了財政地方分權化對經濟成長有正向貢獻的證據。Akai and Sakata (2002) 對兩篇研究單一國家，及一篇研究跨國且都得到財政地方分權對經濟成長負向影響的實證文獻提出質疑，認為那些文獻的資料選擇上出現問題。<sup>17</sup> 而考慮到資料選取上的問題，Akai and Sakata (2002) 採用美國 50 州自 1988

---

<sup>16</sup> 該研究中使用美國自 1948 年至 1994 年的年度時間序列資料 (time series data)，用普通最小平方法來分析。

<sup>17</sup> Zhang and Zou (1998) 與 Xie et al. (1999) 分別使用了中國自 1980 年至 1992 年 28 個省的追蹤資料與美國自 1948 年至 1994 年的時間序列資料。Akai and Sakata (2002) 認為兩文資料選取的時間範圍正好是中美經濟發展的早期階段，經濟高度成長，在這段期間內需要相對高層級的政府來提供會產生巨大外部性的公共投資，中央政府的角色吃重，因此觀察到財政地方分權與經濟成長間負向的關係是可以被預期的。Davoodi and Zou (1998) 使用 46 個國家自 1970 年至 1989 年的追蹤資料來分析，但 Akai and Sakata (2002) 認為國與國之間的文化、歷史與風俗習慣上的差異是實質存在的，因此不易捕捉到財政地方分權化的真正效果，事實上，Davoodi and Zou (1998) 也認為，在發展中國家之間的跨國變異是發現到負向關係的一個理由。

年至 1996 年的州級資料，避開美國經濟高度成長的期間，且由於研究對象皆在同一個國家之內，因此不存在實質的文化、或歷史的差異。接著，使用普通最小平方法進行估計，顯示出財政地方分權化對經濟成長有正的貢獻。而其又於附錄使用追蹤資料 (panel data) 加以分析亦得到正向貢獻的結論。Stansel (2005) 亦支持 Akai and Sakata (2002) 的觀點，認為若利用國家做為分析的單位，跨國間的重大文化、制度差異難以量化加以混合進行計量分析，因此應使用國家之內較小的政治單位。Stansel (2005) 以 314 個美國大城市地區，自 1960 年至 1990 年的資料來做實證分析，並以普通最小平方法進行估計而得到正向的結論。<sup>18</sup>

除了對美國的研究之外，Agundez-Garcia (2000) 採用地方政府自身收取的財政收入，佔地方總財政收入的比例作為衡量財政地方分權程度的指標，並以西班牙 15 個地區自 1991 年至 1996 年的追蹤資料，使用普通最小平方法進行估計，得到財政地方分權不利於地區性經濟成長的結論。

至於以多個國家進行分析的實證研究，就財政地方分權化對經濟成長的效果，亦無法呈現一致的結論。Davoodi and Zou (1998) 使用 46 個國家自 1970 年至 1989 年的追蹤資料，來探討財政地方分權化對經濟成長的影響，且實證發現發展中國家的財政地方分權化程度與經濟成長有顯著且負向的關係，而在已發展國家中兩者沒有顯著的關係。

Davoodi and Zou (1998) 對於發展中國家何以呈現負的效果提出四點解釋；第一，認為政府支出的構成，沒有區分是否為對刺激經濟成長有益的資本支出，或是福利、社會安全等等對經濟成長較無影響的一般性流動支出。第二，在不同層級政府間錯誤的稅收任務分配也可能導致低度的經

---

<sup>18</sup> Stansel (2005) 指出多數的研究都專注在垂直的分權，如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來檢測分權化與經濟成長的關係，但本文作者則特別針對水平的分散權力，來探討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性。

濟成長。第三，效率利得是支持財政地方分權化最強有力的理由，但是由於地方支出的決策，在發展中國家往往還是受到中央的限制，因此，在發展中國家無法體現效率利得。第四，事實上地方政府可能無法因應地方的需求及偏好。這大多發生在地方官員並非由當地人民所選出，且地方居民可能因為過於貧窮而無法選擇自己所偏好的區域居住。

Iimi (2005) 則使用 51 個國家自 1997 年至 2001 年的跨國資料，而分析為了避免短期的經濟波動導致衡量誤差，特別使用 1997 年至 2001 五年的平均每人實質 GDP 成長率作為被解釋變數。作者以工具變數(instrument variables) 與普通最小平方法兩種計量方法進行實證分析，發現都能適切地解釋，財政地方分權化對於每人實質 GDP 的成長在 1990 年後期，的確有正向且顯著的衝擊。<sup>19</sup> 文獻中作者亦提出先前理論與實證間的矛盾有幾個可能存在的理由；第一，分權化可以被分為三個面向，分別為政治面、財政面與管理面，但是這三個面向彼此是相互關聯的，難以單獨衡量出財政地方分權化的效果。第二，地方政府在計畫與執行地方公有企業上的能力不足，特別是缺乏有經驗的人才。這意味著，分權化對於經濟成長的影響可能需要一段時間之後才能看見。第三，理論假設居民的自由移動可能是不實際的，尤其是在短期之下。

綜上所述，可發現的是，眾多探析財政地方分權化對於經濟成長影響效果之相關文獻，皆專注於兩者間直接效果之探討。Martinez-Vazquez and McNab (2003) 觀察到這樣的現象，於其研究即指出，財政地方分權有以多種間接方式，對經濟成長造成影響之可能性。並企圖提醒政策建言者與決策制定者，財政地方分權化對於經濟成長的效果，尚未被完全清楚地瞭

---

<sup>19</sup> Iimi (2005) 考慮進兩個重要的計量問題加以處理，分別為內生性 (endogeneity) 與跨國間的異質性 (cross-country heterogeneity)。為了解決內生性的問題，作者運用工具變數 (instrument variables) 的技術。另外，如同在 Akai and Sakata (2002) 所指出，跨國之間的資料具有各個國家文化、風俗習慣上的巨大差異，為了在一定程度上調和這樣的問題，實證的模型設計中也加入了所得群組和特定地區的固定效果。

解，在決策制訂或是政策施行上，必須更加謹慎以對。

而其後，Martinez-Vazquez and McNab (2005) 使用 52 個國家，自 1972 年至 1997 年的非平衡式追蹤資料 (unbalanced panel data)，並將財政地方分權以收入面與支出面兩面向來衡量，<sup>20</sup> 接著使用二因子固定效果模型 (two way fixed effects model) 對於財政地方分權與經濟成長的直接與間接關係作實證檢驗。

而依據其實證結果發現，在收入面的財政地方分權與通貨膨脹率間，<sup>21</sup> 呈現顯著且負向的關係；然而，在支出面的財政地方分權與通貨膨脹率間，並無顯著的關係。<sup>22</sup> 至於財政地方分權與經濟成長間的關係，其實證結果無法發現任何直接的關係存在。<sup>23</sup> 但值得注意的是，由於收入面的財政地方分權對通貨膨脹率存在顯著且負向的作用，而估計之實證結果又顯示，通貨膨脹率與經濟成長間，存在顯著且負向的關係。因此，財政地方分權將透過降低通貨膨脹率，藉由通貨膨脹率的降低，帶給經濟成長間接的正向刺激。

綜上所述，根據其研究發現，在財政地方分權與經濟成長間並沒有顯著的直接關係；但財政地方分權將透過對於物價的穩定作用，經由促進總體經濟穩定方面間接地對經濟成長具有正向貢獻。Martinez-Vazquez and

---

<sup>20</sup> Martinez-Vazquez and McNab (2005) 文中，將財政地方分權分為財政收入面與支出面兩面向加以衡量。由於其以國家作為分析單位，因此該文以地方政府總財政收入佔全國財政收入，作為收入面財政地方分權的衡量指標；而以地方政府總支出佔全國總支出，作為支出面財政地方分權之衡量指標。

<sup>21</sup> 該文以消費者物價指數 (consumer price index) 的變動率，作為衡量通貨膨脹率之指標。

<sup>22</sup> 該文將樣本細分為三組子樣本，分別為已開發國家、開發中國家與轉變中 (transitional) 的國家，亦發現三組子樣本中，收入面的財政地方分權與通貨膨脹間，呈現顯著且負向的關係；而支出面的財政地方分權與通貨膨脹間，皆無顯著關係的發現。這顯示出，財政地方分權對於通貨膨脹率的影響，與國家發展階段無關。

<sup>23</sup> 該文為了確認，財政地方分權是否會以非單調 (non-monotonic) 的方式影響經濟成長，亦於其實證模型中，加入財政地方分權變數之平方項。但於其所估計出之財政地方分權變數，與財政地方分權變數平方項之迴歸係數皆不顯著，無法顯示財政地方分權與經濟成長間存在直接的關係。

McNab (2005) 對這樣的實證結果提出解釋，其認為設計或實行不佳的財政地方分權政策，可能使得地方政府過度借貸，而威脅到總體經濟的穩定性。上述之相關實證文獻皆詳列於表 1。



表 1：財政地方分權化對經濟成長影響之相關文獻

| 研究者                                 | 樣本期間                  | 使用方法         | 主要結論   |
|-------------------------------------|-----------------------|--------------|--|
| Davoodi and Zou( 1998 )             | 1970 - 1989<br>46 個國家 | 普通最小平方法      | 實證發現發展中國家的財政地方分權化程度與經濟成長間有顯著且負向的關係，而在已發展國家中則沒有顯著的關係。   |
| Xie et al. ( 1999 )                 | 1948 - 1994<br>美國     | 普通最小平方法      | 1. 認為在含有不同層級的政府支出下的內生成長模型，我們可以證明財政地方分權化會影響長期的經濟成長率。<br>2. 美國現存的各級政府支出佔聯合政府支出比例，已經與成長極大化下一致，若是再進一步的分權化則可能對經濟成長造成傷害。 |
| Agundez-Garcia ( 2000 )             | 1991-1996<br>西班牙      | 普通最小平方法      | 實證發現財政地方分權化對於經濟成長有顯著且負向的關係，且認為進一步的分權化可能不利於經濟成長。  |
| Akai and Sakata ( 2002 )            | 1988 - 1996<br>美國     | 普通最小平方法      | 考慮兩種資料選取的問題，避開經濟高度成長的期間，並採取同一個國家內的資料避免文化或歷史的差異。估計顯示出財政地方分權化對經濟成長有正向貢獻。   |
| Iimi ( 2005 )                       | 1997 - 2001<br>51 個國家 | 工具變數與普通最小平方法 | 考慮進內生性問題及跨國間的異質性，發現財政地方分權化對於每人實質 GDP 的成長的確有正向且顯著的衝擊。   |
| Stansel ( 2005 )                    | 1960 - 1990<br>美國     | 普通最小平方法      | 特別針對水平的分散權力，來探討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性，經由普通最小平方法估計得到財政地方分權化與經濟成長正向的結論。  |
| Martinez-Vazquez and McNab ( 2005 ) | 1972-1997<br>52 個國家   | 二因子固定效果模型    | 在財政地方分權與經濟成長間並沒有顯著的直接關係；但財政地方分權將透過對於物價的穩定作用，經由促進總體經濟穩定方面間接地對經濟成長具有正向貢獻。  |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註：本表文獻依年份排列順序。

### 第三節、中國財政地方分權化對經濟成長影響之相關文獻

如前所述，本研究之主要目的為探討中國的財政地方分權化，對於地區性經濟成長是否存在貢獻，而若確有效果產生，該效果又是正或負。以下將針對幾篇研究中國財政地方分權化，對於地區性經濟成長是否存在貢獻的相關文獻，加以審視相互之間的關係。

Zhang and Zou (1998) 文中，以中國自 1980 年至 1992 年，28 個省的年度資料，採用追蹤資料進行估計，並以省政府的支出佔中央政府總支出的比例，或是該比例的變化，來衡量財政地方分權程度。結果發現在中國財政地方分權化程度與省的經濟成長之間，有著顯著且一致地負向的關係。Zhang and Zou (1998) 認為這樣的實證結果對於一些發展中的國家或是轉變中的經濟體，在追求財政地方分權方面存在著一些政策意涵。<sup>24</sup>

不同於 Zhang and Zou (1998) 的結論，於 Ma (2000) 探討財政地方分權化對於各省市經濟成長表現的實證研究中，就財政地方分權化刺激省級經濟成長的部份則得到與 Zhang and Zou (1998) 相反的結論。Ma (2000) 以 1983 年至 1991 年各省政府預算稅收的平均保留比例，做為衡量財政地方分權化程度的指標，並使用普通最小平方法進行估計，得到財政地方分權化程度與省的經濟成長間呈現正向且顯著的關係。

而後，Lin and Liu (2000) 則認為上述兩篇實證文獻用來衡量財政地方分權程度的指標都有缺點。Ma (2000) 以省政府預算稅收的平均保留比例來衡量財政地方分權的程度，但 Lin and Liu (2000) 認為這個指標無法

---

<sup>24</sup> Zhang and Zou (1998) 認為中央政府在經濟發展的早期，是具有相對於地方的優勢去掌握那些外部性可能廣及整個國家的公共投資；但更重要的是，如果地方的稅收和支出佔總稅收和支出的比例已經相當高，則再進一步的進行分權化可能會導致較緩慢的整體經濟成長。

體現自 1980 年代以來，中央與地方間財政關係的變化。在改革之前有些省份的財政收入大於支出，也就是對中央的預算有所貢獻，若按 Ma(2000) 所採之衡量方法，財政地方分權應早就開始。但在統收統支 (tongshou tongzhi) 的財政制度下，省級政府的任何開支都必須獲得中央的批准。其次，Ma (2000) 使用的是平均保留比例，但 Lin and Liu (2000) 認為實際上會影響省政府行為的卻是邊際保留比例。Zhang and Zou (1998) 文中則是以省政府的支出佔中央政府總支出的比例，或是該比例的變化，來衡量財政地方分權程度。但這樣的衡量指標分母相同，所以分權化程度的大小就僅僅取決於省政府的支出，然而，可以說地方政府的支出越多，則其財政地方分權程度就越高？該省就擁有較高的財政自由度？實際上如此的衡量指標，只能反映該地方人口與經濟規模的大小。

針對上述兩篇文章衡量方式的缺點，Lin and Liu (2000) 則以省政府預算稅收的邊際保留比例 (marginal retention rate) 來做為衡量財政地方分權程度的指標，同時在模型裡放進其他同時間發生的改革變數，使用中國 28 個省級單位，自 1970 年至 1993 年的省級追蹤資料進行實證分析。實證結果發現財政地方分權化對省級經濟成長具有顯著且正向的作用，這與傳統理論上財政地方分權增進經濟效率，進而刺激經濟成長具有一致的結論。依據該文的實證結果，可得出以下兩點結論；第一，制度的安排十分重要。除了財政地方分權之外，其他的改革也對中國的經濟成長起到有利的作用。<sup>25</sup> 第二，根據資料的顯示，財政地方分權主要是透過提高資源的配置效率來影響經濟成長，而不是透過引發更多的投資。

Jin and Zou (2005) 則是最新一篇，針對中國的財政地方分權化對地區性經濟成長進行研究的實證文獻。該研究使用了中國 30 個省分，自 1979

---

<sup>25</sup> Lin and Liu (2000) 亦發現農村的改革與非國有部門的發展對過去 20 多年中國經濟成長也有關鍵的貢獻。

年至 1999 年的追蹤資料，來檢驗中國兩個階段的財政地方分權與省級經濟成長間關係。<sup>26</sup>此外，該研究與先前分析中國的文獻所用來衡量的財政地方分權指標亦不相同，其使用支出與稅收兩個方面來衡量財政地方分權化程度，共有 4 種財政地方分權化程度的衡量指標：支出方面有兩種指標，(1) 省預算支出佔總預算支出的比重，(2) 省預算外支出佔總預算外支出的比重；稅收方面亦有兩種指標，(1) 省預算稅收佔總預算稅收比重，(2) 省預算外稅收佔總預算外稅收的比重。<sup>27</sup>

經過固定效果模型的估計，且所有係數皆進行過異質性與序列相關的修正後，該研究實證結果發現在第一階段，即 1979 年至 1993 年，省級經濟成長與支出的分權呈現負向的關係，而與稅收的分權呈現正向的關係。意即，進一步的稅收分權化與支出集權化將有利於經濟成長。而第二階段，即 1994 年至 1999 年，省級經濟成長與支出的分權無法呈現統計上顯著的關係，而與稅收的分權則呈現顯著且負向的關係。

而根據其實證結果，Jin and Zou (2005) 認為透過稅收與支出的權力下放予地方，來促進地方的配置效率進而刺激經濟成長，在中國此兩階段的情況下效果是不同的，且稅收與支出的地方分權程度應進一步的背離 (diverge)，對經濟成長才帶來利益。而其研究結果，與先前部分文獻認為財政地方分權可能不利於經濟成長有相同的見解。且其亦特別強調制度的確有實質上影響力的基本論調，認為任何狀況下財政地方分權的效果皆相當仰賴財政制度與政治體系的性質。

---

<sup>26</sup> 第一個階段是 1979 年至 1993 年，分析在「財政契約制」(fiscal contract system) 下的效果；第二個階段是 1994 年至 1999 年，分析在「分稅制」(tax assignment system) 體制下的效果。而其分析分為兩個階段的主要的目的，乃為分析於 1994 年政策轉變的效果。

<sup>27</sup> 因 1979 年至 1993 年，稅收都由省級政府來收取，因此平均而言，省級稅收佔總稅收的比例較省級支出佔總支出的比例大，意即，此段期間稅收的分權程度較支出為大，而其間差異就在地方上繳給中央的部分。反之，1994 年至 1999 年此段期間由於自 1994 年的改革，有相當大比例的稅收轉由中央收取，因此支出的分權大於稅收的分權，其間差異則是中央移轉支付給地方的部分。

除了上述相關的實證文獻外，關於中國之財政地方分權，亦有相關文獻指出，中國的財政改革受到諸多限制。Martinez-Vazquez and Bahl (2003) 文中即指出，中國財政改革的效果除了受到租稅政策 (tax policy) 與租稅管理改革 (tax administration reform) 之限制，亦受到其他看似與財政領域相去甚遠的經濟政策所束縛，以致於財政系統的運作效率降低。其文中指出，中國人口遷移政策、退休金系統與銀行系統，都對中國的財政改革有相當程度影響力。<sup>28</sup>此外，並指出中國的人口遷移政策、金融系統，以及追逐全球化與工業的發展，更加深了沿海與內陸各省市間經濟發展的巨大差異。然而，於 Martinez-Vazquez and Rider (2005) 文中再指出，中國的財政地方分權並未充分改善資源配置的效率，並藉此達到中國成長的潛能。其認為即使目前中國正經歷著高度的經濟成長，但是成長的速度與質量尚可能透過政府間財政系統適當的改革而進一步提高。<sup>29</sup>以上所述有關探討中國財政地方分權化對地區性經濟成長影響的文獻，皆詳列於表 2。

---

<sup>28</sup> Lin and Liu (2000) 於衡量中國財政地方分權對地區性經濟成長影響時，亦考慮入其他同時進行之改革，對地區性經濟成長之效果。而發現農村的改革與非國有部門的發展對過去 20 多年中國經濟成長也有關鍵的貢獻。

<sup>29</sup> Martinez-Vazquez and Rider (2005) 亦指出，印度之情況與中國相當相似。

表 2：中國財政地方分權化對經濟成長影響之相關文獻

| 研究者                  | 樣本期間              | 使用方法               | 主要結論  |
|----------------------|-------------------|--------------------|---|
| Zhang and Zou (1998) | 1980 - 1992<br>中國 | 虛擬變數模型與隨機效果一般最小平方法 |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政府支出的高度財政地方分權化，將連繫著低度的省級經濟成長。且外商直接投資具有外溢效果。</li> <li>2. 認為中央政府在經濟發展的早期，是具有相對於地方的優勢去掌握那些外部性可能廣及整個國家的公共投資。</li> </ol>                 |
| Ma (2000)            | 1980 - 1996<br>中國 | 普通最小平方法            | 以省政府預算稅收的平均保留比例來衡量財政地方分權的程度，實證結果發現財政地方分權化與經濟成長呈現正向的關係。  |
| Lin and Liu (2000)   | 1970 - 1993<br>中國 | 二因子固定效果的追蹤資料模型     |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實證結果發現財政地方分權對經濟成長有顯著的作用。且發現農村的改革與非國有部門的發展對過去 20 多年中國經濟成長也有關鍵的貢獻。</li> <li>2. 財政地方分權主要是透過提高資源的配置效率來影響經濟成長，而不是透過引發更多的投資。</li> </ol>   |
| Jin and Zou (2005)   | 1979-1999<br>中國   | 固定效果的追蹤資料模型        |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實證結果發現透過稅收與支出的權力下放予地方，來促進地方的配置效率進而刺激經濟成長，在中國的情況下是不起作用的。</li> <li>2. 認同制度的確有實質上影響力的論調，並認為任何狀況下的財政地方分權效果皆相當依賴財政制度的狀態與政治體系。</li> </ol> |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註：本表文獻依年份排列順序。

## 第四節、本章小結

由於本文主要之研究目的，為探討中國的財政地方分權化，對於地區性經濟成長而言，所扮演的角色究竟如何。因此，本章先回顧了過去探析與本文研究主題相關的既有文獻，並於第一節回顧財政地方分權理論之相關文獻；於第二節中回顧財政地方分權化對經濟成長影響之相關實證文獻；最後，於第三節中回顧中國財政地方分權化對經濟成長影響之相關文獻。而本節將以上三個部分，加以歸納整理如下。

首先，在第一節的財政地方分權理論中，針對傳統財政地方分權理論進行回顧。經由眾多相關理論文獻之整理，發現理論上的文獻，基本上都支持財政地方分權化對於經濟成長存在正的貢獻。Hayek (1945) 與 Oates (1972, 1993) 都認為，地方政府相較於中央政府具有較有利的訊息優勢來提供滿足地方偏好及需求的公共服務，因此財政地方分權能增加經濟效率。而 Bahl and Linn (1992)、Bird (1993) 與 Bird and Wallich (1993) 亦認為財政地方分權化或是財政權力的下放，是一種可以改善公部門效率的方式，進而減少預算赤字，並促進經濟的成長。而 Davoodi and Zou (1998) 觀察到多數的傳統經濟理論文獻贊成財政地方分權化，是基於兩個互補的假設。第一個假設是，由於地方政府的訊息優勢，使得其相較於中央政府而言具有較佳的能力來提供公共服務；而第二個假設是人口的可移動性 (population mobility)，以及地方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務間的競爭性，方能確保地方民眾的偏好與地方政府所提供之公共服務能夠契合。觀察傳統的財政地方分權理論可知，在理論上，財政地方分權化能增加經濟效率，進而刺激經濟成長，幾乎是被一致同意的。

其次，在第二節中對分析財政地方分權與經濟成長間關係之實證文獻

加以整理。主要包括 Davoodi and Zou (1998)、Xie et al. (1999)、Agundez-Garcia (2000)、Akai and Sakata (2002)、Iimi (2005) 與 Stansel (2005) 等研究美國與西班牙，及以國家為單位進行跨國分析的實證文獻。而就目前的實證文獻而言，關於財政地方分權化對經濟成長影響的效果均沒有一致的看法。有些實證文獻無法在財政地方分權化與經濟成長間發現任何關係，甚至得到否定傳統財政地方分權理論所提出，財政地方分權化增進經濟效率，並進一步刺激經濟成長的結論。

另外，由於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在於探討中國的財政地方分權化，對於地區性經濟成長而言，所扮演的角色究竟如何。因此，在本章第三節中特別對相關實證文獻加以回顧。主要相關文獻包括 Zhang and Zou (1998)、Ma (2000)、Lin and Liu (2000)，以及 Jin and Zou (2005) 等。綜合以上的實證文獻，可發現的是中國的財政地方分權，在地區性經濟成長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仍然沒有可一致被接受的實證結論，分歧依舊存在。

總而言之，本研究藉由眾多分析財政地方分權與經濟成長間關係的文獻，給予本研究於探究中國的財政地方分權，在地區性經濟成長上所扮演的角色時，更全面而縝密的考量，盡量避免分析的偏頗。並且，以財政地方分權理論作為理論基礎，在參考了眾多既有相關實證文獻對各重要解釋變數的探討，並經檢定確定模型設定無誤後，即建立本研究的實證模型。

儘管已有如前所述之眾多文獻，已探討過相近的議題，但本研究在下列所述之方面仍能與其加以區別：1. 蒐集更新更全面的資料，使本研究的資料為截至目前為止，分析中國財政地方分權與經濟成長間關係文獻中，資料最新的一篇研究，並冀以得到更趨近真實情況的研究結果；2. 鑑於中國在 1994 年進行了分稅制改革，因此特別著重本研究的分析期間在中國最近一次的財政改革上；3. 進行更多更嚴謹的統計檢定，以盡量減少研究發生錯誤的機率；由於這些差異性，使本研究異於既有文獻。